

□ 人物剪影

发出含混的简单词句），颤抖着吃力地说：“我…不…退…休！我…还…能…干，我…还…要…回…去…”。

由于健康和其他原因，翌年彭光钦还是含泪离开了“两院”，调回广州，任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回广州后，彭光钦日夜思念着“两院”，常常感到心神不宁难以入睡，整天唠叨着要回“两院”看一看。为了满足他的心愿，同年9月，由女儿陪同，专程让他回到海南岛儋县阔别了8年的“两院”，寻踪觅迹，拜访同事、故友。有的同事见他回来，拥抱着他失声痛哭，有的曾经整过他的人，私下托人送来一篓鸡蛋。这一切使彭光钦潜伏在心底的感情如激流涌动，他躺在床上哭了，哭

得那么伤心，那么凄惨。是什么力量使他的心灵颤栗呢，是胶园里一棵棵生机勃勃的橡胶树，还是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善良的脸？是实验室，是图书馆？是他打扫过的茅坑，还是粘过他膝盖鲜血的砂粒？是的，是这一切，唤醒了他生命逝去的执著和回归。若不是白发苍苍，若不是病魔缠身，若不是……无论如何他也不离开和同事们共同创建、倾注了他毕生心血的橡胶园。返回广州不久，他旧病复发，身体彻底垮了，双腿不能动弹，完全丧失了语言功能。

1991年9月21日，彭光钦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享年85岁。

选自《广东民主人士名人传》

回忆父亲朱广福

○朱新兰

清明，慎终追远的日子，父亲朱广福（右白）逝世50周年了，早就该写点文字纪念他了！

我坐在落地玻璃窗内的书桌前，阳光照进来，暖融融的，杏花、李花、樱花、桃花，次第开放，鸟儿喳喳来回欢唱。七十有三的我，享受着退休的安宁生活。想起我的父亲，他的晚年却没过过一天这样的生活。

父亲于1896年阴历九月出生在江苏省泰兴县南门外毘卢寺与新镇市当中的西六圩书香人家。叔祖朱铭盘（曼君）先生以诗文享誉公卿间，与周彦升、张季直同参吴武壮幕府，随军驻扎朝鲜，为中东事变



从一九二七年编印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上扫描的朱广福学长仅有的照片

的幕后人物。其父朱月清是个忠厚老实、不多言语、在家坐馆的塾师兼看小儿科的中医。父亲幼秉父教，勤奋学习，嗜吟咏

之性成，乃至终生治学不倦。奶奶是个裹小脚的女人，高嗓门，勤劳能干，待人热情。凭着三五十亩祖产，把我父亲培养到清华国学院毕业，确实不易。无怪乎奶奶有句口头禅：“南门外几十里，哪个不晓得我儿朱广福是清华国学院毕业的？！”我想，这是她的骄傲，是她为儿子而骄傲，更是为清华国学院而骄傲。

父亲1926年夏考上了清华国学院，学的是儒家哲学，师从梁任公，受惠终生。毕业之后，他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当了十多年的编辑。生活比较安定，著作甚丰。日寇入侵破坏了正常生活。母亲直到晚年还时常说起日本人轰炸闸北，十九路军淞沪会战的故事。母亲生我于兵荒马乱之中，又是难产，幸而由大德医院救活了大人孩子。我四个月大就随母亲返回老家，跟祖父母一起生活了。我的母亲张淑宏出身泰兴名门，是金陵女子大学吴贻芳的叔伯表妹，泰兴首富张伯鼎的女儿。她知书达理，更是乐善好施。

我童年眼里的父亲，个子高高的，手臂很长，走起来，两手一甩，飞快，架上一副眼镜，远远的，我就认出是他回家来了。遗憾的是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太短暂了。

1947年冬天，我9岁了，才来到父亲身边。他当时在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当编辑。我从乡村来，父亲带我到琅玕路小学报名，交学费上学。父亲每日按时上下班，吃饭、休息，星期日也从不外出，不看电影也不看戏。有点闲暇全用在看书、写文章上了。我印象中的父亲是没有歇息的。之后又兼任金陵女子大学的历史、地理等课程。

父亲对我的教育是随缘因势利导的。1948年冬，父亲带我到金陵女子大学参加该校圣诞节联欢会。父亲和朋友们相互打招呼，我则目不暇接地张望着。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过后，一位戴着眼镜、身着中式旗袍的中年女士登台讲话，父亲说吴校长讲话了，我一听就高兴地大喊起来：“吴贻芳，吴贻芳！”这就是我从从小就听母亲和姨妈常说起的“吴贻芳”，女中豪杰，亲戚中的骄傲啊！但在这大庭广众中，我这个小毛孩子却直呼其名，这是多大的不恭敬啊！但父亲没有呵斥我，只是低低地对我说：“应该叫‘吴校长’。”又有一次，看到“哲学”这个词，我就问父亲，这是什么意思？对于一个小孩子，解释它太难了，父亲就说，“哲学就是科学之母”。哈哈，这几个字，我一下子就记住了。直到长大之后，我才渐渐明白它的含义，由此，启发了我对文史哲的喜好。

父亲饭后，常常双手背在后腰，在不大的房里踱着步子。之后，就是与书为友了。我又大了两岁了，认识的字也多了些，只见什么“鲜卑”，“羌人”，“匈奴史”啊，什么《禹贡》、《水经注》、长江、黄河变迁啊等等书啊、稿子，常常铺满一桌子。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中凡先生是父亲的好朋友，星期天常来。他和父亲各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中间是一张小茶几，上面有两杯茶。他们谈得很开心，有时又不说话，好像在思索。一来就是半天。他从来不用带礼物来，父亲也从来不用留他吃饭，一切都自然、随意，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解放前夕，我路过颐和路父亲工作的图书馆门口，几次见到在大门口有堆放着

□ 人物剪影

的大木头箱子。听父亲说，那就是要运走的书。解放后，大约在1949年四五月份，父亲曾拿一张《新华日报》回来，对我们说，这报上登有他的名字，因为他抵制将图书运往台湾立了功。父亲满腔热情迎了解放，之后工作也更忙，回家也常常更晚了，有时说是到成贤街图书馆（总部）开会，有时又说是听苏联专家报告。

1951年至1952年期间，父亲被派往苏州华东革命大学学习，并参加赴安徽农村土改工作队。

之后，父亲被调往福建省立图书馆，离开南京的家，只身前往福州。1953年夏，父亲得知我升学考试落榜，并没有责怪我，只是在信上说，要学习司马迁“奋发图强”。我订了学习计划，决心改掉贪玩的毛病，奋发上进，将初中三年的功课一一复习周到。次年，我考上了百年老校——四女中（汇文女中），并分在甲班。年老的父亲确实是我视为“命根子”的，我的哥哥英年早逝，留下两个三、五岁的孩子，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父亲把工资一分为三，寄往泰兴老家我的母亲和寡媳孤孙，寄往南京的家，最后留下一点给自己，月月一发工资就赶往邮局，我们总是按时收到他的汇款。他从未说过自己的艰辛。在福州的二三年中，他一面工作，一面写了大量的书稿，请人代为誊写并打印出来，无形中又增加了他的大量开支，只有节衣缩食了。

1956年，全国知识分子大会召开，“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吹响了，秋高气爽之时，他接到进京工作的调令。从福州到北京，路过南京的家，只停留了两三天。他告诉家人，告诉前来看望他的南京图书

馆的老同事，这次下调令，是经水利部长批准的跨省跨行业的调动，实属不易啊。这是国家建设的需要，是国家对他本人多年来研究祖国大江大河的历史变迁取得成就的肯定啊！六十岁的父亲和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一旦受重用，那种迸发出来的热情，甘洒热血写春秋的精神，使他变得更年轻了，也感染了周围的人。送行的老朋友中有位称之为王老的老先生，作了一首五言诗送行，最后一句是“步步光明路！”我们都是这样想的。

1958年2月，与平常一样，在收到父亲月月汇款的同时，也收到父亲的来信。这次信就一页纸，寥寥几句，“陷入右派泥坑”这几个字一下子跳入我的心里。我是1957年暑假考入苏北师专（现在的扬州大学）的，一进校，就在叫作风雨操场的大厅参加旁听对右派分子的批判、批斗。我赶快拿着父亲的信找领导汇报，其时，我正在申请入团。开始，我给父亲写信，一次又一次地问，“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会坠入右派泥坑？”9月，父亲信上说：“正在赶写、完成一批水史方面的论著，向国庆献礼。”年迈的父亲，身遭不测之时，也还是在想用一技之长为祖国建设做点事的啊！一生做学问的他，能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呢？父亲始终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看来是残酷而无法面对的。

父亲信中告诉我被派到十三陵水库劳动，还表示要好好接受改造。工资被减去过近一半，但他仍然按时按原标准寄给我，直到我毕业参加工作，生活自立。感谢父亲让我从小学到大学在经济上从来没有受窘。

1961年1月21日，父亲等三人的户口都从北京市被迁回农村——泰兴昆卢寺。寒假，我回到老家，见到了不到65岁的父亲，头发已经花白了，面容憔悴（后来从他箱子里的医院检查单看，他在这之前已有肺病），穿着单薄，一套灰布棉制服，穿了多年了，真不知道在北京那种严寒里怎么过来的。父亲的一生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他是孝子，孝顺他的父母，兵荒马乱中，还回老家看望父母；他负担两位夫人、儿女、孙子四代人的生活，他是个对家庭极端负责的人。我在家过了十多天，父亲虽遭厄运，但从不向女儿诉说心中的悲凉，还是和平常一样，态度是积极的。我到家之前，门上已经贴上他写的春联了，房门上写的是孙子上学要努力，“姑姑入团受教育”之类的话。他知道我一直在争取入团，而且前一年冬天曾回老家请地方上开证明，这表达了他对女儿要求进步的鼓励。

父亲不曾和我谈今后怎么办，怕增加我的思想负担吧。那时的我实在不懂事，没有也不知道安慰父亲。父亲曾同我谈到我所在的新沂县沂河的历史沿革，我好奇地问：“爸，你怎么知道的？”其实，整个中国的大江大河都装在他心中！我无法设想他今后的生活，只是想把他已经在北京上中学受连累回来的侄子带到我身边继续上学，把我的母亲也接到我身边，这样可以减轻父亲身边的负担。垂垂老矣的父亲，好像寒风中摇曳着的油将尽的灯火。他冷，我摸摸他的手，没有一点热气，我说：“爸爸，我给你织一件毛线衣，就暖和了。”但他没来得及穿上我织的毛线衣，他培养了我20年，我却对他没有一点

回报！当时他还担心我返程路费不够，又塞给我十几块钱，这就是父亲的心啊！没想到，这次回家就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别了。

1961年的春夏之交，父亲去世了，棺木钱是向村上做豆腐卖的大篮家借的。我拿着信找到校长、主任，他们都很仁慈，二话没说，批了救济金15元，我赶快汇回去，总算为父亲做了点事。

就在这年暑假，我回到泰兴老家，父亲留下的一只破旧柳条箱陪伴了我整整一个假期。里面主要是文稿，完成的、未完成的，卡片一张张、一捆捆。我记得，《红楼梦考证》是在福州图书馆工作时写的，请人誊写、装订得很规范；《诗人罗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他自己誊写的，也装订得很规范，都是用的红格子稿纸。《中国主要河流变迁史》是用蜡纸刻写油印的，还有一本《中国语文》杂志（1955年第40期），上面有父亲的一篇文章：《关于〈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名称及其他》。更大量的是水史方面的文章。还有一些学者、专家的往来信件，如谭其骧、侯仁之、徐近之、谢国桢、王了一（即语言学家王力）等。还有水利部门收到父亲文稿、材料的回信等。

这些文稿中有不少是写在巴掌大的香烟纸上的，而父亲是不大吸烟的，是捡来写稿用的啊！有的上面是用铅笔头写的字，听家里人说：直到病倒前一天，他还在饭桌上铺满稿子，修啊改啊，沉思、再写，并对家人说，我这些稿子都是有用的，对国家建设有用。字字句句都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子之心！

对这些稿子，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

□ 人物剪影

都是肯定的。父亲用了多年的时间，用了清华恩师所授研究和考证的方法，也用了在天津高等化工学校所学的分析方法，将有关典籍资料一一查全，分析求证，得出结论，确凿可信，颇受有关部门重视。但当时“政治挂帅”，一个右派要出书，谈何容易。根据父亲以前联系过的地址，我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院研究员徐近之联系，他来信问是否可以寄去让他看看。于是我将全部有关资料厚厚一大捆寄去了。有个假期，我还和我同学一起去单位拜访过他。事隔大约二年，他将稿子退寄给我老家，事后我曾再次拜见他，他只是说已叫单位的人全部抄下来了。在那种情况下，他能如实告诉我，而且将主要部分能寄还我，也算不错了。该单位能抄下一套也是很好的。

1980年，我们又根据父亲原来留下的线索与交通局上海航道局联系，他们原来就熟悉我父亲水史方面的成就，非常重视，专门派了一位工程师来看稿子，之后，他们说要全部的原件，并愿付一些奖金。家人觉得父亲的遗愿实现了，遗著能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用就很好，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于愿已足！现在这批原著就存在上海航道局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的工作单位对他亦予落实政策：平反昭雪，抚恤遗属。父亲在九泉之下，可以心安了。

搜集整理父亲的书稿，从旧书店买、网购，从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图书馆去查询复印，经过我和先生的努力及朋友的帮忙，终于找到了他的主要著作。书目如下：

《鲁阳集》

《中国诗的新途径》

《孟子话解》

《朱右白诗》

《诸家人性论评述》

《右白丛书》上下

《帝王年祚与其生活》

《论文拾零》

《中国水史论丛》篇目（未出版）

其中：《鲁阳集》，1933年6月由女子书店出版发行，于右任先生题词，清华同学侯堉作序。几十年后，父亲当年的同窗姜亮夫教授还对我爱人杨洪清提及《鲁阳集》：“令岳利用神话鲁阳挥戈驱日，来激励军民抗击日寇，我印象很深。”

《中国诗的新途径》，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诗坛名家、清华国学院讲师林志钧（宰平）认为：“此书为中国诗新旧绝续之交万万不可少之一种著作。”父亲不仅诗写得好，而且关于诗的理论研究也很透彻。

《孟子话解》，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该馆特约以我父亲为主编写的，目的在于帮助初学，普及国粹。它广受欢迎，后被商务总经理王云五收入《人人文库》，1972年、1973年在台湾再版发行。

父亲从小喜欢的一是诗歌二是哲学，这两样成了他做学问的主攻方向。而后就转向研究起历史地理、江河变迁了，1947年曾有三篇论文发表在《中国评论》上。

多年来我一直想写关于父亲的回忆。我努力搜索着有关父亲的记忆，翻阅着一本本父亲的著作，关于父亲的印象、父亲的学术历程逐渐清晰起来。与此同时，我仔细看了夏晓虹、吴令华编的《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书中写的人，有些是父

亲的恩师，大多数则是父亲的同学。“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这些人我都喜欢、敬仰，更感到亲切，似曾相识。不仅仅因为我在父亲写的诗里、文章里读到过他们的名字，知道一些他们的专业和成就，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上和我父亲有着许多惊人相似之处：对恩师都无比爱戴，对同窗无比情深，对清华的学习生活无比怀恋。正如蓝文徵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始末》所说：“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生命”。念书，做学问，安身立命，对学术执着的追求，他们在各自研究的领域都大

有建树。短短只有四年的清华国学院，犹如昙花一现，却能芬芳永驻；培养的七十多名毕业生却引领了那个时代国学的发展，成了撑起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栋梁，这真是一则永恒的神话！我为父亲曾在清华念过书，有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同学而高兴，我也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回忆父亲的文章终于写完了。我水平有限，只求将有关事实交代清楚，值此父亲逝世50周年之际，借以寄托心中的思念，也是对父亲的母校——清华百年校庆献上的一份薄礼！

2011.4

清华学校教务长杨恩湛

○胡康健

杨恩湛（1878—1937），字仲达，是1915年—1919年清华学校的中文教务长。

杨恩湛是江苏常州人，常州的杨姓堂号中，以四知堂最著名，杨恩湛正是四知堂的后裔。青年时期，杨恩湛向往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同乡、同学吴瀛一起，辗转湖北读书。1899年就读湖北官立中学自强学堂英文旧班。

1903年，湖广总督端方在湖北全省各学堂选了10名优秀学生赴美留学，杨恩湛名列其中。同年，梁启超受斯坦福大学校长佐顿氏邀请至其校演说，由杨恩湛等留学诸君陪同参观伯克利大学一周。留学期间，学校每月有成绩报告中国学督，杨恩湛所攻英、法、德三国语言等课程，均成



一九一六年出版的《清华年刊》上杨恩湛的照片

绩优秀。

1904年，杨恩湛虽然“远适异国”，却“心切宗邦”。闻湖北一年派出留学生上百，同时，建校十余所，但是仅湖北